

曾经风光的商学院缘何遭遇“身份危机”

学术圈不是名利场 科研本色是“安静”

■樊秀娣

早就听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诺贝尔奖得主的特殊待遇，是为其提供一个校园内的终身停车位，对此一直印象深刻。不久前又听说，美国密苏里大学对该校自1839年建校以来的首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乔治·史密斯授予了至上的荣誉：一个专属的自行车停车位。

据媒体报道，包括布朗大学、杜克大学、南加州大学、西北大学的诺奖得主们都有“黄金”车位——许多车位上还写着“诺奖得主专属”。对于“黄金”车位的“黄金”价值，伯克利校方做了最精辟的解释：诺贝尔奖是荣誉，不需要用利益或特权来显示，提供专属停车位就是对荣誉致敬。

致敬荣誉，道出了科研工作的本质。科学研究是发现真理、揭示真相的崇高事业，广大科研工作者甘愿几十年坐“冷板凳”，完全是出于对内心对于科学的兴趣和爱好。在常人眼里，科研工作“曲高和寡”，是单调寂寞的苦差事，而在科学家心目中，这是一项充满挑战 and 刺激的有趣乐事。而且，在学术科研领域，最令人尊重的是对科学探索的执着和投入，得到满意研究结果的科研劳动有价值，没有得到满意结果的劳动付出同样珍贵无比。所以，把诺奖视为荣誉，是对科研工作最深刻的理解，是对获奖者的祝贺，更是对科研劳动至高无上的敬意。

科研的世界，博大而单纯。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获奖时还只是滑铁卢大学的副教授，她从没申请过正教授。一个副教授职称就够用了，如此淡泊名利，足见唐娜的世界多么简单和纯粹。而另一位与她同获物理学奖的法国科学家热拉尔·穆鲁不久前在北京大学与师生交流时，说的最多的是“要有平常心”。他说，“在我看来，得诺奖固然好，没得，就好好工作。只要你潜心研究，尽你最大努力，以你的研究造福世界，就很好了。”穆鲁的话，诠释了国人推崇的“得之坦然，失之淡然”的人生境界。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也有这样的“平常心”。他获奖后推迟召开新闻发布会，照常去给本科生上宏观经济学课程，如此淡定，恰恰体现了一位学者内心的高洁和超脱。

学术圈不是名利场，“重赏”压不出“高产”。要按科学的内在规律办事，在保障科研人员体面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扭转浮躁、急功近利的不良学风。

为此，首先要纠正把国家科研项目视为“名誉+经费”的简单认识，扭转项目申报过度注重申请人的头衔、资历的倾向，而是要让科研经费分配、使用回归科研需要的本身。对科研项目的评审、鉴定，要更注重项目成果本身，更注重看取得的实际效果，而不能由项目负责人“自说自话”。

同时，作为制度保障，要坚决严惩各类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丑恶现象，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学术不端行为，违背学术道德和科研守则，不仅造成国家科研经费大量流失，还让中国科研的国际声誉遭受严重破坏，同时也使广大遵纪守法、诚信自律的学者和科研工作者的利益受到极大侵害，对这一类的“害群之马”绝不该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而姑息。

上月，科技部等五部门发文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这一反“四唯”专项行动，势必会进一步改变一些用人单位过分看重“帽子”效应而不顾人才实际使用价值的错误导向。

大力弘扬追求真理、严谨求实、民主平等、敢于质疑、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科学精神，创造安静、宽松的学术环境，让各类人才都能潜心于各自的职责和使命，最终拿出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社会，这是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最大心由，也是中国科研迈向一流的心由之路。

（作者为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管理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方若

中国商学院一度拼命引进海归学者做研究、发论文，努力提升国际排名，同时与大量海外商学院合作。但在一些发达国家，商学院之间的合作并不是为了合写论文，而是为了研究管理实践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商学院是根据西方商学院的经验在发展。发达国家的商学院经历长期发展后，已步入成熟期。为此，中国商学院一度招聘了很多海归教授。这些学者回国后，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热门文章，从事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

但时至今日，我们的商学院似乎走入了一个怪圈：总是为了学术而学术，面临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当老师走上讲台，学生们往往发现，老师的研究与现实管理中的实践关联不大。尤其是在MBA或EMBA课堂上，企业家们带着问题坐到教室，希望能和老师对话，却往往失望而归。在我看来，如今的商学院，有能力为企业家上课的教师大约不到10%。

这一现象的成因当然很复杂。比如，商学院的评估和排名都集中在论文指标上，为了迎合这些指标，老师们不得不发表一些“短平快”的文章。长此以往，就形成一种不好的趋势：大家关起门来在小圈子里搞研究，甚至为了提升论文影响力，学者之间“拉帮结派”，相互示好。更有甚者，为了追求学术上的创新，而不顾实践需求。期刊也是如此，往往更看重论

文的表面功夫，讲个故事了事，没有实践，也没有学者关注实践。

其实，这一现象在全球商学院都很普遍。包括我任职过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一些知名商学院就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希望能够有所改善。我在沃顿商学院运筹管理专业读博士时，就亲历了系里老师们的争论。当时系里招聘新教师时，常常邀请在校博士生去旁听。这些应聘者演讲的很多题目都是深奥的数学模型，与实践的联系很少。他们试图通过建构数学模型，形成一套理论。但在商业实践者看来，这些看上去很复杂的理论，往往是在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时，系里的教授们对此争论很大——这究竟是不是商学院需要的“学术”？

后来，商学院对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研，了解他们的真正需求。在商学院的课程改革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的诉求与教授的研究之间差距相当大。学术研究往往是把某些问题简单化或复杂化，甚至是为不现实的问题寻找精确的解。这些问题的发现，对于商学院改革有重要指导意义。

什么是好的学术研究？看似高深、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这是评价商学院学术能力的标准吗？事实上，这些标准本身就充满了问题

归根到底，商学院目前遭遇的很多问题都源于评价体系。当下几乎所有的评估和排行榜，都将论文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商学院的排名要提升、知名度要提升，很多时候不得不靠论文。

当然，要推动评价体系的改革很难。因为我们真的曾经很缺乏论文，所以很渴望有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希望短时间内在学术方面有很大进步。包括对老师的评价也是以论文为指标。但单一导向往往会引发学术问题，尤其是商学院这样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能与实践距离太远。海外高校之所以问题相对没那么严重，是因为大学实行终身制，教授进入终身制

后相对压力小了，总会有一部分人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而关注实践。可国内的商学院不一样，一切考评都以论文为目标。最近，双一流建设也将教授对社会实践的贡献列入评估指标，不过，这究竟该如何做，仍需要有科学的研究。

商学院变革的动力有一部分来自外部，包括校友关注等，但要真正改变的是评价标准本身。作为大学的商学院，评价仍应以学术为主，而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是好的学术”的评价标准。

从国际经验来看，哈佛商学院的评价标准相对比较科学。他们对教授

中国的商学院要在穷理与务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改变商学院研究就要改变价值导向，让教师在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两者兼而有之。具体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还需不断探索，但毫无疑问，这将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冲破现有的种种约束。

50年前的商学院研究与行业关系很密切，但不严谨，当时的商学院学者就提出应引进新的研究方法，于是就引进了数学模型等。技术的变化使得管理场景不断发生变化，商学院也要不断适应新的场景。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商学院未来计划成立一些行业研究院，对各个行业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从而带来基础理论的贡献，并且要扎根中国的管理实践，推动经济的发展，完善管理理论。我们希望通过行业研究打破学术壁垒，通过重塑价值观改革学院体制机制，最终回归商学院的本源。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此文由本报记者姜澎整理）

大学英语：如何避免“水课”成就“金课”

■蔡基刚

日前举行的2018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教育部将全面整顿本科教学秩序。他说，“有人说专业是人才培养的腰，腰要是好的话，这个人站不直，挺不起胸、抬不起头。因此，对不起良心的专业应该停办了。”“要消灭‘水课’，打造有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

在国内高校，确实存在一些“对不起良心的专业”和“水课”，必须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反思。

每年20万毕业生是否真为社会所需？

什么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我认为有几个标准：

- 1）这个专业的培养规模并不是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或需求极少；
- 2）这个专业的教学内容不能满足大多数选择这一专业的大学生的需求；
- 3）这个专业的存在，无非是满足学科自身得以继续保留的需要；
- 4）这个专业之所以不顾需求继续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无非是这些学生是教授能成为硕导和博导的基本条件。

如果用“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这四个标准去衡量，我们就会发现：不少高校的英语专业似乎正在接近“对不起良心的专业”。

目前，全国1448所普通本科高校中，超过千所设有以“英美语言文学”为主要方向的英语专业，在校学生总数超过60万人。除了外语类大学、师范类大学和综合性大学，连农业、石油、

海洋、医学、邮电、地矿这样的特色院校也都设有英语专业。一个专业点的学生少则上百，多则几千。我国每年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有近二十万人。

问题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尤其是对新工科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否需要这么多研究英美语言或英美文学的毕业生？

就上海一地调查，仅有5%不到的英语专业毕业生继续攻读英美语言文学或英语教育的硕士学位，其余都到了银行证券、事务所和企业等工作岗位，还有相当多的英语专业毕业生甚至就业到无需任何英语技能的岗位。学生调查显示，不少考入一般高校英美语言文学的硕士生是无奈被调剂过来的，之所以违心攻读英语硕士，无非是为了一个硕士学位。也有企业发现，尽管一些毕业生拥有四级、六级英语专业证书，但无法胜任软件、工程、法律领域的国际交流。

过去几年，高校英语专业已屡屡被预警，进入就业的红、黄牌行列。即便如此，许多高校外语学院还在大量招收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学科建设需要和国家社会需要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在牺牲学科硕士博士点、牺牲教授学术前途和牺牲学生利益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

英语专业应积极转型，奋起自救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开还是关的艰难选择。智慧的外语学科建设决策者完全可以改变英语专业单一的研究方向，在外国语言学学科之下，将原本的英美语言文学或翻译学转向国家紧缺的国际复合型新工科人才的培养，如医学、工程、农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与英

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

英语专业人士应放弃“英语教育本质上是人文教育”的片面观点，承认英语是一门汲取和交流专业领域国际前沿信息的工具；同时改变只要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就能胜任任何专业和行业国际交流的看法，接受充足的语言技能储备必须结合特定语境进行训练这一最基本的语言学理论。

一些英语专业人士往往认为，他们能教英美语言文学，但没有师资教授医学、工程和农林等专业领域的英语。实际上，后者是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也还是语言教学，不是教专业的内容知识，而是教学生如何用英语来汲取和表达这些领域的内容，增强学生在专业领域内的国际交流能力。因此，英语教师经过适当学习和转型，完全可以胜任。

英语专业，已经病得不轻。2018年教育部本科专业申报中，有五所学校的英语专业拟撤销。但也有一些有远见的高校正在奋起自救，积极转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不支持外语系设置英美语言文学的本科和硕士点，停招后他们转向科技英语，与专业院系合作开设“文理复合英才班”，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武汉大学正在开设“英语+材料”或“英语+财经”“英语+营销”等双学位课程。

因此，英语专业要成为对得起良心的专业，除少数高校继续保留英美语言文学方向，走少而精的路线之外，大多数院校要转型到专门用途英语方向。一个专业只有始终把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只有积极对标国家战略，这个专业才不会在时代中落伍，作出自己应有的作为。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